

# 中國現代史論集

張玉法·主編

第五輯 軍閥政治



主編者 張玉法  
編輯者 林載爵 朱雲漢 王克文

---

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五輯 軍閥政治

---

# 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五輯 軍閥政治

69.7.0399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第三次印行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精裝本二六〇元  
平裝本二一〇元

主編者 張 玉 法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7683708・394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30 號

• 61013-5 •

## 「中國現代史論集」總敍

張玉法

近年以來，國內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風氣漸盛，不僅發表了許多論文，也出版了不少專書。但論文多發表於各種學術期刊，流傳不廣；專書卷帙浩繁，無暇遍讀。如能將這些論文加以搜集，專書加以評介，然後分類編輯成書，必然對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人很有幫助。當然，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著有成績者並不限於國內，美、日及歐洲許多學人，亦早就在這方面有所貢獻，惟國內缺乏有系統的介紹。如能將美、日及歐洲各國研究中國現代史的論文加以翻譯，專書加以評介，然後分類編輯成書，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切磋琢磨之功。基於這個構想，經過數年的考慮與籌劃，決定編一套「中國現代史論集」，俾供學界參考。

這部「中國現代史論集」共分十輯，第一輯「總論」，選錄有關貫穿全時代的論述，包括政治史、經濟史，與社會史，可略窺中國現代史演變的軌迹。第二輯「史料與史學」，選錄有關中國現代史史料與史學的論述，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俾使研究者能按圖索驥，進一步閱讀專書，搜集史料，研究問題。第三輯「辛亥革命」，選錄有關辛亥革命的論述，包括領導人物、革命團體、革命宣傳、經費籌措、國際關係各方面。第四輯「民初政局」，選錄有關

民國元年至五年間政治演變的論述，包括政黨政治、二次革命、洪憲帝制等方面。第五輯「軍閥政治」，選錄有關民國五年至十七年間軍閥政治的論述，包括軍閥的派系、軍閥人物、軍閥的對外關係等方面。第六輯「啓蒙運動」，選錄有關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前後數年間中國思想啓蒙、文化更新、和政治覺醒的論述。第七輯「護法與北伐」，選錄有關民國六年至十七年間中國國民黨革命活動的論述。第八輯「十年建國」，選錄有關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間國家建設的論述。第九輯「八年抗戰」，選錄有關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間中日戰爭及其有關問題的論述。第十輯「國共鬭爭」，選錄有關民國十三年到三十八年間國民黨與共產黨鬭爭的論述。

前述十輯，每輯約三十萬字，各輯皆有例言，說明選文的標準與廣度。文章的性質一般分為三類：①選錄已經發表的論文，②評介已經出版的專書，③以前未經發表或新撰寫的論文。就文字分，原用中文撰寫者約佔一半，譯自英、日文者約佔一半。在此僅向專書及論文的原作者、論文的翻譯者、和專書的評介者致謝，沒有他們的成就與貢獻，將使本書的編輯工作無法進行。

本論集所收各文，來源不一，為尊重作者之行文及徵引習慣，註釋體例均保存原刊形式。「索引」之編製，以有關中國現代史重要名詞為主，便利檢索。

本論集的編輯工作，除選定論文外，主要是對英、日文論文的翻譯，和英、日文專書的評介。林戴爵、朱雲漢、王克文三位先生為此事出力甚多，他們找到數十位朋友幫忙，終於能够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十本書編輯完成。我們非常感謝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使這套「中國現代史論集」，能以精美的校印，與讀者見面。

## 第五輯例言

本輯題名「軍閥政治」，主要概括民國五年到十六、七年間軍閥操持國政期間的政治情形。此一論題，國內學術界的探討尚少，故大部篇幅，都集中在外國研究成果的譯介上。本輯選文二十二篇，分為一般解釋、歷史敘述、軍閥政治、軍政派系、聯省自治五部分。

第一部分「一般解釋」選文二篇，陳志讓的「中國軍閥派系詮釋」（由陳家秀小姐譯出），係以討論薛立敦的「中國軍閥」一書為基礎，從各種角度解釋中國軍閥派系的性質；謝文孫的「軍閥的經濟解釋」（由林戴爵先生譯出），除論述區域性的經濟結構以外，並闡明經濟因素對軍閥政治的影響。

第二部分「歷史敘述」選文二篇，蔣方震的「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從清季的湘淮軍論到民初皖系當政時的北洋軍，是從軍事史來看民國初年的軍閥；胡夢華的「中國軍閥之史的敘述」，以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關係為主要論題，不僅敘述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前的軍閥，且論及北伐完成以後的軍閥。

第三部分「軍閥政治」選文八篇，張玉法的「評介派氏著『軍閥政治』」及王克文的「軍閥在現代中國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從不同的角度評介派氏的「軍閥政治」一書，該書對民初軍閥政治的性質有多方面的分析。林滿紅的「評介齊著『中國軍閥政治』」和陳明鍊的「齊著『中國軍閥政治』評介」，是從不同角度評介齊錫生的「中國軍閥政

治」一書，該書以「國際均勢」的觀點，剖析民初軍閥政治的大勢。王綱領的「評介薛著『分裂中的中國』」和李疏影的「由『分裂中的中國』看軍閥政治的概況」，是從不同角度評介薛立敦的「分裂中的中國」一書，該書以軍閥為中國現代歷史中的重要因子。張朋園的「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爭與憲政不果』」和王克文的「評介黎安友著『北京政治』」，是從不同的角度評介黎安友的「北京政治」一書，該書論述了軍閥割據時代中央政權的狀況。所以每書皆選兩篇評介性的文字，乃因有的偏重介紹，有的偏重評論之故。

第四部分「軍政派系」選文七篇，徐炳憲的「段祺瑞的三次組閣」論述皖系的情形，楊清順的「評介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論述奉系的情形，唐遠華的「『中國軍閥——馮玉祥的一生事業』評介」和史特賴姆斯基的「馮玉祥與英國的關係」（由林貞惠小姐譯出）論述國民軍系的情形，麥金鴻的「『軍閥——閻錫山在山西』評介」論述閻系的情形。另外，麥肯農的「梁士詒與交通系」（由劉正芬小姐譯出）和戚世皓的「官僚資本家的活動——曹汝霖與他的新交通系（1916—1919）」（由馮鵬江先生譯出）論述軍閥時期影響政治最大的一個文官集團。軍政派系太多，此處所列舉者，不過示例而已。

第五部分「聯省自治」選文三篇，謝諾的「聯省自治運動（1920—1923）」（由張瑞德先生譯出），總論軍閥時期各省謀求自治的情況；碩巴的「省與國：浙江省的自治運動（1917—1927）」（由劉汝錫先生譯出）和阮毅成的「讀浙江制憲史」則專討論浙江自治的情形。

因限於體例篇幅，軍閥時期的經濟、社會、外交等方面的狀況，本輯均無專文討論。不過，有些散見於其他各輯中，可以對本時期的史實作一補充。

# 目錄

「中國現代史論集」總敍.....	張 玉 法	I
第五輯例言.....		III

## 一般解釋

中國軍閥派系詮釋.....	陳 志 讓	3
軍閥的經濟解釋.....	謝 文 孫	33

## 歷史敍述

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	蔣 方 震	45
中國軍閥之史的敍述.....	胡 夢 華	63

## 軍閥政治

評介派氏著「軍閥政治」.....	張 玉 法	93
軍閥在現代中國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 克 文	105
評介齊著「中國軍閥政治」.....	林 滿 紅	111
齊著「中國軍閥政治」評介.....	陳 明 錄	121
評介薛著「分裂中的中國」.....	王 綱 領	127
由「分裂中的中國」看軍閥政治的概況.....	李 疏 影	135

- 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爭與憲政不果」 ..... 張朋園 149  
評介黎安友著「北京政治」 ..... 王克文 159

### 軍政派系

- 段祺瑞的三次組閣 ..... 徐炳憲 169  
評介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 ..... 楊清順 217  
「中國軍閥——馮玉祥的一生事業」評介 ..... 唐遠華 225  
馮玉祥與英國的關係 ..... 史特賴姆斯基 233  
「軍閥——閻錫山在山西」評介 ..... 麥金鴻 253  
梁士詒與交通系 ..... 麥肯農 267  
官僚資本家的活動——曹汝霖與他的  
新交通系(1916-1919) ..... 戚世皓 293

### 聯省自治

- 聯省自治運動(1920-1923) ..... 謝諾 315  
省與國：浙江省的自治運動(1917-1927) ..... 穎巴 353  
讀浙江制憲史 ..... 阮毅成 375  
索引 ..... 387

# 一般解釋



## 中國軍閥派系詮釋 陳志讓

本文原發表於 *Londo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Bulletin*, Vol. XXXI, Part 3 (1968).  
由陳家秀小姐譯出。

二十世紀的中國軍閥很少受到學術界的重視<sup>①</sup>。而這種忽視，除了薛立敦(James E. Sheridan)在其書(「中國軍閥——馮玉祥的一生事業」——*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前言所陳述的理由外，主要是由於這些人及其所處的時代，在歷史上的意義沒有完全為人所知。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們何以能興起而獲致如此大權力，他們的濫用職權對中國社會有何影響？為什麼五四運動、華盛頓會議、中國共產黨之成立、國民黨的改組和五卅慘案，均以軍閥政治的失敗為其背景？而 1860 年間的中興事業又被這些軍閥破壞到何種程度？這些都是相當適切的問題。同時，在僅僅十六年中(1912-28)，一千三百多個大小軍閥發動了一百四十次以上地方性(省內)及省際的戰爭，因而這段時期必有其複雜性，但是史家的好奇心不應該因此而裹足不前。

① 薛立敦(James E. Sheridan)，中國軍閥——馮玉祥的一生事業(*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最近，美國提出了若干有關中國軍閥的研究計劃，這實在是令人興奮的消息。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必能將此論題從「報紙的名人瑣談專欄」的地位，而納入正確的歷史地位。薛立敦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鋒，而其所著「中國軍閥——馮玉祥的一生事業」，也是在此範疇內的第一部著作，同時這也是一本相當出色、值得學術界重視的傑作。

既然這是一本關於軍閥的書（並非一個普通的人），我們當然會問薛立敦對軍閥所下的定義是什麼？而薛立敦在其書第一頁就說：軍閥是藉著不受外力控制的軍事組織，在一定的區域內行使有效的統治。依薛立敦的看法，軍閥軍隊私屬性的特質，主要是沿襲著清朝而來，因為在晚清即有此傾向。而若就其無法獻身於超私人的原則和目標這個層面上來說，北洋軍就是軍隊私有（私軍）最顯著的例子。（薛書頁8、頁16）

如果薛立敦對所謂「超私人的原則」所下的定義是指對國家或君主的效忠，這個定義是易為人所接受的，但是如果其意指合法化的區域性利益，我們就不能給予其很高的評價。為了對軍閥下一適當的定義，我們必須對促成軍閥主義(warlordism)成長的要素作進一步探討，而在這方面，我們實得力於在薛立敦之前一些學者的觀點。譬如說費正清(J. K. Fairbank)在其著「美國與中國」(*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書中，就說到有關中國軍閥主義的成長及其在地理上的基礎：

因為苦力軍隊易於徵召，再加上中國各省份往往都有天然的地理界線，因而易形成不受外力控制的軍區（即軍省），同時軍閥之割據地又往往集中在經濟重心，像廣州三角洲、四川的成都平原以及長江下游的河谷地帶。費正清的第一點理由——苦力軍隊易於徵召——和陶希聖所提出的觀點相符。陶希聖認為盜賊、軍隊之起因當追溯至游

民及中國過剩的人口。陶希聖說：

剩餘人口……便是軍國國家與割據軍閥成立的原因<sup>②</sup>。費正清的第二點理由說明了軍閥割據的地理基礎，但是這二項理由並沒有考慮到為什麼軍閥會在 1911 年以後才興起，因為在當時人口過剩的現象早已存在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即使在清朝君主政體衰敗的時期，也不曾有軍閥主義。而即使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他們促使地方主義的成長，他們也不能算是軍閥。

如同費正清，王造時對「地方觀念」也很重視，並視之為促成軍閥主義興起的要素之一。他認為：

一般軍閥政客看透了這種心理，於是不惜利用同鄉的觀念，去團結他們的勢力。普通人民受了這種心理的遺毒，也去攀龍附鳳的追隨，做他們的工具<sup>③</sup>。

就王造時的觀點來看，這種地方觀念是直、皖、奉等軍閥派系形成的原因，同時也是鼓吹聯省自治的原因。

王造時進一步為軍閥主義之出現尋求強而有力的歷史理由。他認為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前，滿洲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閉鎖的而且停滯的社會。而在辛亥革命後，

現在我們一旦把君主踢倒，政治的中心，當然隨之失落；中心一失落，又無新的民主中心勢力起來代替，結果，當然要釀成二十年來，掛名共和，軍閥混戰的怪現象<sup>④</sup>。

依王造時的看法，這些軍閥雖受新思潮的影響，但卻不為傳統舊倫理、舊道德的約束，於是日趨分化，而成為軍閥割據、互相砍殺的無政府狀態<sup>⑤</sup>。

② 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上海，1929，頁 86。

③ 中國問題的分析，上海，1935，頁 49。

④ 同上，頁 161。

⑤ 同上，頁 167。

王造時指出 1911 年辛亥革命後，中國失去其政治生活之中心而又不能為一種新的、民主的力量所取代，是已觸及到問題的重心，這當然也就是薛立敦所謂的「超私人原則」。滿清的覆滅，導致了忠君觀念的式微，而這種真空不僅應該為一種新的、民主的力量所填補，同時，也當為愛國精神所充塞。但是大部分軍閥，特別是北方的軍閥對這種觀念並不了解。而這裏所稱的愛國精神是一種新觀念，乃是在 1894-5 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所引入的，同時，進一步地深植在 1898 年戊戌變法時維新份子及二十世紀初期革命份子的心中。但是對那些教育程度較低的軍人來說，這種觀念既不能深入其心，甚至在表面上也都不能影響他們，因為大部分的軍閥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因此這些軍閥並不如王造時所說的，是受著新思潮的影響。而他這種概括性的敘述不僅不適於北方軍閥，而且也僅適於小部分的南方軍閥。

梁漱溟也將軍閥主義視為介於舊社會秩序崩潰和新社會秩序重建之間，一種過渡時代的產物，進而尋求其歷史理由。既然軍閥和土匪之間沒有什麼基本的差別，梁漱溟認為就如同貴族依恃封建體制、資本家依恃資本主義社會生存一樣，軍閥是不恃任何社會秩序而生存。相反的，他們的存在反而使得社會秩序不穩定而且不能有效的運作，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為其所破壞，而政黨政治亦為其破壞，他們不僅逾越於法律與制度之外，甚至毫不靦腆地承認他們是非理性的而且是有破壞性的，而且他們不認為，這會對他們的生存有任何妨礙<sup>⑥</sup>。

<sup>⑥</sup> 梁漱溟認為軍閥和土匪的不同只是在軍力上的差別，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大土匪頭可被「提昇」為軍閥，而戰敗的軍閥自然也就流入土匪之列。鄉村建設理論，鄒平，1937，頁 100-1。並和薛立敦書頁 10 相參照。

軍閥不恃任何社會秩序生存，而就梁漱溟的觀點來看，軍閥並不是過去的遺產，而是在 1911 年辛亥革命、1926 年北伐後所起的新興力量，所以梁漱溟認為革命運動產生了軍閥<sup>⑦</sup>，而 1949 年後，不知他是否修正了其原有的觀點。為了要了解此觀點，同時對其有所詳述，我們必須對中國新建陸軍的起源及辛亥革命一些相關層面作一縝密的考察。

在庚子拳亂、辛丑條約之後，所倖存的唯一一支有組織、有訓練的軍隊就是在袁世凱領導下的武衛右軍。袁世凱這支軍隊的一些重要軍官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時，幾乎均是為保清而戰，而且除了極少數外，他們後來都成為大軍閥。薛立敦（頁 17）認為：「正是這支武力，為主要軍閥的部隊提供了發展基礎。」1911 年以前，這些人在軍事上已居要職的事實，說明了軍閥主義的基礎早在 1886 年就已奠定了，所以梁漱溟的論點是不成立的。而他們之忠於清室可能是由於其所受的倫理教育，但更可能是因為袁世凱在革命的緊要關頭支持清廷。由於清室的覆滅使他們由清朝的軍官一變而為軍閥，而且在討袁、護法戰役後更為明顯。而既然這些軍閥反對 1911 年辛亥革命、1913 年二次革命以及 1916 年的革命，我們就難以接受王造時的觀點，而認為這些軍閥受新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這些軍閥反對革命以及其存在於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前，使我們也不能同意梁漱溟的看法，而認為辛亥革命創造了這些軍閥，革命運動並沒有創造他們，僅僅是加速他們的成長。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成為軍事上的領導者，革命運動只是使其成為「軍閥」而已。

⑦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鄧平，1937，頁 361。

但是北方軍官並不是新軍唯一的領袖。我們發現 1911 年辛亥革命時，長江以北的留日軍官除了伍祥楨（第十二旅）和張樹元（第十旅）以外，不是被解職（即張紹曾和賈賓卿），就是被打敗（即藍天蔚），或是被暗殺（即吳祿貞）。反之，長江以南的大部分軍官卻聲明支持革命，下文將會對這些軍官的背景作一敘述。於此，我們當可知這些南方軍官是革命的煽動者，同時也是革命先驅，是他們促使革命，而不是革命創造他們。這是南北軍閥之間一個重要差別。

不過在南方，軍事上的領導者並不是促使革命的唯一力量，同時還有興中會、同盟會之會員如孫中山、章炳麟、汪精衛、胡漢民，各地鄉紳領袖如湖南譚延闔、貴州任可澄、江蘇程德全和四川的蒲殿俊，以及湘、陝、晉、桂諸省的秘密會社，這些領導階層的力量促成了辛亥革命，不過革命的羣衆基礎卻有賴於南方的新軍及秘密會社的奠定。辛亥革命發生後，我們可將各省份作下列分類：(1)軍隊勢力強，而革命團體（特別是秘密會社）的力量弱，屬於這一類的包括除了山西、陝西以外的所有黃河各省，以及福建、湖北。(2)有些地方軍隊力量較弱，而革命團體則稍強，這些地方包括了湖南、貴州、廣東、山西、陝西和四川。(3)江蘇和山東二省中革命團體的勢力和軍隊力量處於一種平衡狀態。(4)安徽和江西二省，不論是革命團體或軍隊的力量均弱。在第一類中，權力掌握在軍事將領手中或者是那些在軍隊中頗得人望的人手中，而第二類中，權力不是在他省軍事將領之手中（如唐繼堯的攻佔貴州），就是掌握在革命軍領袖的手中（如湖南的焦達峯、廣東的胡漢民、陝西的張鳳翹以及四川的尹昌衡）。第三類，情況是有變動性的，而第四類，則是受外